

中国农民的民主价值观：一种经验研究*

钟扬著 张婷译

引 言

中国农民历来被视为一股保守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一般大众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由于其保守的政治文化，中国农民是中国实现民主的主要障碍之一，尽管颇具意义的村委会选举已在中国乡村如火如荼地展开。而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中国农民有非常强的权利意识，并且愿意通过“合法抵抗”来保护他们的权利。^①事实上，一些学者甚至指出，中国农村可能最终将民主化进程导向中国的其他地区。^②

关于中国农民的民主价值观的这种普遍的负面观点是否正确？中国农民的民主价值观的现状如何？中国农民与中国城市居民相比又是怎样的？是哪些因素可能影响着中国农民对核心民主价值的认同或缺失？回答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和预测中国的政治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遗憾的是，在当今中国学界鲜有关于这一课题的实证性研究。本文试图通过阐述在苏南进行的独特调查的结果来为这些问题提供解答。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把来自苏南，这个中国最发达的农村地区之一的调查结果套用到中国其他农村人口上。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农村要比许多人想象中的好得多，而且中国农民对核心民主价值的认同十分强烈，并不比城市居民落后多少。随着中国中部

* 此研究项目受到了田纳西大学研究生院和政治科学系的慷慨支持。作者谨向 Junghyun Kim 为其对研究所提供的统计方面的帮助致以谢意。本文原为英文，由张婷译为中文，钟扬校。

① Kevin J. O'Brien and Li Lianjiang "The Politics of Lodging Complaints in Rural China," in: *The China Quarterly* (143), 1995, pp. 756—783.

② Tyrene White, "Reforming the Countryside," in: *Current History* 91 (566), 1992, pp. 273—277.

农村地区在经济上更加发展,该地区的中国农民将获取今天的苏南农民所持有的民主价值观。这将为中国农村进一步的民主化带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数 据

本次调查是基于在 2000 年夏天对江苏省南部 12 个县所进行的随机民意测验。我之所以选择苏南作为调查基地是出于三个原因:第一,江苏是一个人口密度较高的大省,并且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苏南历来被称为“鱼米之乡”。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以来,因其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引领了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浪潮,江苏的经济得以加速发展。^①由于江苏省一直以来重视知识和教育,加上近期的经济发展,苏南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和识字率远远高于中国大部分其他农村地区。^②如果我们赞同西方著述中关于经济发展同民主化和民主政治发展之间具有正向联系的观点,那么要研究民主在中国农村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江苏看来是首选地之一。第二,由于苏南经济发展水平高,且文盲率低,在那里进行随机调查相对比较容易。第三,我在苏南找到了一位有声望的且可靠的合作者来共同进行调查。

这一同国内研究机构合作进行的调查是从居住在江苏省南部 21 个乡镇,18 岁以上的识字成年农村人口(拥有农村户口)中抽样。^③我们的样

① 苏南经济发展模式常常区别于注重私有企业的温州发展模式和依靠大规模境外投资的珠江三角洲发展模式。

② 江苏的文盲率为 9%,而全国平均文盲率约为 19%,见《苏州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无锡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常州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Suzanne, Ogden, *Global Studies: China*, 8th edition, Sluice Dock, Guilford, CT: Dushkin/MaGraw-Hill, 1999.

③ 我们决定不把不识字的农民纳入调查范围的原因是基于在调查前所做的预测测试的结果。我们在预测测试中得知,大部分不识字的农民在理解问题时有太多认知上的困难,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解释几乎全部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看到当访问者试图向受访者解释问题时,他们往往会带入他们自己的观点或偏见。为了避免这些偏见和诱导下的回答,我们决定在调查中排除文盲人口。幸运的是,我们所调查的地区的农村人口中,只有 9%是文盲。我们认为排除文盲人口应该不会对调查江苏农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结果产生大的影响。而且,即使所有的受访者都是农村户口,他们也不一定在农田里干活。许多人是在工厂或乡镇企业里工作。

本包括 1 270 个对象中的 1 162 个有效回答,采用多步骤随机抽样程序。^①我们雇佣了优秀的、受过培训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实地工作者来开展调查。实地工作者将调查问卷带给随机选择的个体对象填写,然后把问卷带回调查中心。由于采用了这种调查方法,反馈率接近 92%。^②调查对象的影响和语言的错误理解被努力降低到最小程度。在美国设计的原始问卷由我在中国的合作研究机构审核,以使问卷符合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使调查对象确信调查结果绝对保密,并鼓励他们提供最能反映他们真实情感的答案。^③

江苏农民对核心民主价值的认同

稳定而有效的民主制度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众对核心民主价值的认同。很难想象民主制度会在一种严重缺乏核心民主价值认同的政治文化中存活下来。正如前文所表明的,长久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否本质上是权威主义的,从而与现代民主价值格格不入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④中国农民尤其被视为权威主义文化的载体。事实上,中国民主制度的缺失常常被归咎于中国农民。他们被认为民主政治文化水平低下,缺乏民主传统。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学者预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将不可避免地导向渐进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如果人们相信经济发展与民

① 我们在调查中采用了多步骤抽样程序。在第一步抽样后,我们随机选择了 21 个乡镇。第二步抽样后,我们又在每个乡镇中随机选择了 4 个村。第三步抽样又在每个村里随机选择了约 16 户家庭。在江苏农村调查的最终抽样阶段,我们又从每户随机选择的家庭中,随机选择了一位成年人作为调查对象。我们总共随机选择了 1 270 位调查对象;其中 1 162 人对我们的调查进行了回答。

② 关于在中国的高反馈率,见 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关于在中国进行民意调查,见 Melanie, Manion, "Survey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 Learning from Local Surveys," in: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1994, pp. 741—765.

④ Goldman, Merle,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

主化之间存在着联系。^①这些年来，政治学学者已确立了以下核心民主价值：政治宽容，崇尚自由，公民/政治权利意识，支持竞争性选举。^②这些就是我们在江苏农民调查中所获取的价值观，同时也是研究中的应变量。

表1所显示的结果表明，接受我们调查的农民都强烈认同民主选举。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这样的观点：未经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乡镇和县级官员应当由公众选举产生。接近60%的受访者不支持国家政府的领导干部由上级领导指派。在另一项调查问题中，我们问道是否所有的村党委书记应当由公众选举产生。绝大多数受访者(82%)支持由公众选举村党委书记。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现在的村民自治所遇到的主要限制和障碍是这样一个事实：村党支部书记是权力最大的干部(或称“一把手”)，而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通常是党支部书记的副手。然而，党委书记并不是由公众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缺乏权力，这严重削弱了中国村民选举的意义和有效性。

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大多数受访者不愿放弃民主选举，即使选出来的官员并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人们往往倾向于对民主抱有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认为民主提供了解决特定问题的方法。然而，大部分受访者看来坚决拥护民主选举，即使选举也许并不能解决村里的问题。关于由选举引发的潜在动乱和不稳定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同样有说服力。大多数受访者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选举如果带来了动乱和不稳定，就应该被废除的说法。应当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经历了诸多世纪的剧变、革命和动荡后，对“乱”已怀有一种特殊的恐惧。混乱的“文化大革命”在人们心中仍记忆犹新。因此，考虑到中国人对稳定的传统顾念，这样的调查结果就显得格外有意思了。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种强烈的公共参与精神。

① White, Gordon,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White, Gordon,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1, 1994, pp. 73—92; William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②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James L. Gibson, Raymond M. Duch, and Kent L. Tedin,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4(2), 1992, pp. 329—371.

超过 60% 的受访者并不相信精英政治,而超过 50% 的人支持公民的参与权利,不管其知识和教育水平如何。这些调查结果与中国农民缺乏政治民主文化的负面看法相矛盾。

表 1 民主价值 I (%)

	完全同意	基本同意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说不清	人数
县级和乡镇干部都应通过选举产生	59.8	33.6	2.6	0.3	3.4	1 156
国家政府的领导干部最好是由上级领导指派	9.6	23.6	39.1	18.3	9.0	1 156
假设通过选举产生的领导不能改善本村(地)的现状,那么就没有必要搞民选了	12.9	23.4	34.8	18.5	10.0	1 156
假如民选搞得有些混乱,那么就没有必要搞民选了	9.9	22.3	36.9	20.1	10.4	1 156
只要领导能力强,又得到人民的信任,那么老百姓就不必参与做决定	8.8	24.3	37.8	23.0	5.7	1 156
无论老百姓对有关问题了解如何,每个人最好都能参与做决定	18.3	34.3	29.5	8.9	8.7	1 156

资料来源:江苏农村调查,2000 年。

表 2 显示了对新闻自由、宽容度,以及政治效用的态度的调查结果。新闻自由似乎受到了我们的调查对象的极力推崇。调查中的绝大多数农民认为应当给予新闻媒体更多自由来曝光诸如官员腐败之类的不法行为。大部分受访者还认为,非官方媒体应当被允许和官方媒体共存。接近 90% 的受访者赞同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和其他人一样的言论自由,而不管其政治信仰如何。另外,50% 的受访者反对这样的观点:示威和集会应当被禁止,因为这会引起动乱和不稳定。这些调查结果再次否定了这种传统思维,即中国农民在社会和政治上具有保守性,其价值观与民主制度水火不容。实际情况是,在大部分调查问题上,江苏的农民受访者同我们

在北京调查的城市居民相比，回答得同样好，甚至超过了北京市民。^①

表 2 民主价值 II (%)

	完全同意	基本同意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说不清	人数
我国的新闻媒体应有更多的自由去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及政治官员的腐败行为	62.5 (66.7)*	28.4 (26.5)	3.5 (6.0)	0.3 (0.7)	5.1	1 157
民办的新闻媒体应该允许与官方媒体同时存在	32.3	42.9	7.3	2.0	15.0	1 157
不管一个人的看法如何，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57.6 (40.8)	32.0 (45.5)	5.1 (11.9)	0.4 (1.8)	4.4	1 157
集会游行容易造成社会混乱，所以这样的活动应该禁止	14.0	24.5	36.1	14.8	10.3	1 156

资料来源：江苏农村调查，2000 年。

* 括号内的数字是综合 1995 年和 1997 年北京调查的结果。

受访者对以上问题的回答经过整合计算后形成一个附加指数，以获取关于某一受访者的核心民主价值认同水平的总体情况。在研究中，该指数被用来作为多变量分析中的应变变量。

影响民主价值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

研究中我带入若干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作为自变量，从而假定性地解释受访农民对核心民主价值的认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已达到了何种程度。这些自变量分别是：社会经济满意度、收入、政治满意度、自由市场价值观、政治效用、有所感知的政治改革需求，以及主要的社会人口统计变量。

^① 关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北京市民进行的两次调查，见 Yang Zhong, Jie Chen, and John Scheb, "Mass Political Culture in Beijing: Findings from Two Public Opinion Surveys," *Asian Survey* 38(8), 1998, pp. 763—783.

社会经济满意度

在研究民主国家的稳定性时,许多学者将个人对社会经济状况的满意度确立为发展和维持稳定的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①然而,Finifter 和 Mickiewicz 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苏联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越高,对[民主]变革的接受能力就越低”。^②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对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越满意的人,在政治定位上更趋向于保守。尽管在个人生活满意度与民主价值认同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上,已成立的民主国家与在转型期的权威主义社会之间似乎有所区别,但这种区别可能不是真实的。关键是变革或维持现状。针对这两种情况所能提出的合理假设是,可能不管人们生活在哪一种制度下,对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越是满意的人,对社会变革就越不支持,反而更倾向于维持现状。这也许对生活在民主国家和生活在权威主义国家的人来说同样适用。

基于以上分析,我推测我们的调查对象的生活满意度对他们的民主价值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有证据显示,在中国新致富的人和近年来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人确实在政治上变得保守了。同时,执政党试图通过提高生活水平(或 eudemonism)来增强合法性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③

① Inglehart, Ronald, “Values, Objective Needs and Subjective Satisfaction among Western Public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9, 1977, pp. 429—458; Inglehart, Ronald,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amuel H. Barnes, Barbara G. Farah, and Felix Heunks, “Personal Dissatisfaction” and “Political Dissatisfaction,” In: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Samuel H. Barnes and Max Kaase, ed.,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pp. 38—407, pp. 409—430.

② Ada. Finifter and Ellen Mickiewicz, “Redefin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SSR: Mass Support for Political Change,”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1992, pp. 857—874.

③ Yang Zhong, “Legitimacy Crisis and Legitimation in China,”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6(2), 1996, pp. 201—220.

因此我们假设调查中对的社会经济状况越满意的农民，就越不支持会导致潜在的巨大政治变革(即民主化)的核心民主价值。

在研究中，我通过让受访者给两项陈述打分来衡量他们对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满意度，即“在改革时期我的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和“在改革时期我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高”。针对这两个问题，我们要求受访者用1到4的数字范围来标明他们的满意等级，其中“1”(或“很不同意”该陈述)代表“非常不满意”，而“4”(或“完全同意”该陈述)则代表“非常满意”。(这些数字经过计算后形成每一受访者的附加指数，从而成为社会经济满意度的自变量。)结果(见表3)并不令人惊讶。绝大多数(接近90%)受访者赞同关于改革时期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的说法，而66%的人感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同一时期也获得了同样的提高。事实上，与在20世纪90年代末从北京汇总的调查数据相比，江苏省南部有更多的人强烈赞同他们的生活状况在改革时期得到明显改善这一说法。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苏南是中国最发达的农村地区之一。

表3 社会经济满意度水平(%)

	完全同意	基本同意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说不清	人数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您的生活是否得到明显的改善	41.7 (36.7)*	47.5 (51.7)	6.8 (9.8)	0.8 (1.8)	3.2	1 149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您的社会地位是否得到明显的改善	22.3 (19.1)	43.3 (46.1)	18.4 (27.6)	4.43 (7.2)	11.0	1 149

资料来源：江苏农村调查，2000年。

* 括号内的数字是综合1995年和1997年北京调查的结果。

收 入

与生活满意度这一变量紧密联系的是人们的收入。收入在西方著述

中一直被当作人们政治行为和倾向的影响因素。例如,收入较高的人往往政治定位保守,且因其在现存体制中的既得经济利益而倾向于维持现状。依照前文所述的关于生活满意度与民主价值认同之间关系的相同逻辑,我推断收入越高的人对核心民主价值的认同就越低,因为后者会导致中国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政治满意度

政治满意度是研究中另一个用来说明核心民主价值认同的自变量。政治满意度指的是,受访者对其所在地的政治环境和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依照前文解释社会经济满意度与民主价值认同之间关系的相同逻辑,对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和政府绩效感到满意的人,可能不太会认同可能导致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民主价值;而对政治环境和政府绩效非常不满的人,则更有可能认同那些价值。针对政治满意度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即评估地方官员挥霍公款吃喝宴请之风的严重性,地方政府的清廉程度,以及地方官员对当地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的回应度。

表4显示的调查结果也并不令人惊讶。看来大部分受访者对中国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并不满意。私用公款吃喝宴请在中国是个严重的问题,并且在中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公众不满的主要根源。我们的调查表明,近一半的受访者感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或在他们当地很严重。然而,很大比例(接近20%)的受访者不愿意对这一敏感问题发表意见。当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地方政府为建设廉洁政府做了些什么时,超过50%的人认为地方政府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此外,很大比例的受访者不愿回答这个问题。更大比例的受访者赞同或强烈赞同关于地方政府极少对他们的意见或建议作出回应的说法。总体情况是,我们的农民受访者对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有高度或较高度度的不满。受访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经过计算加总后形成了一个附加指数,作为多变量分析中的政治满意度自变量。

表 4 政治满意度水平(%)

	很严重	比较严重	不太严重	不存在	说不清	人数
据您了解,本地干部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情况如何	8.0	36.3	33.4	2.7	19.5	1 150
	很好	好	不好	很不好	说不清	人数
那么您认为本地廉政建设如何	1.6	21.2	42.8	11.0	23.2	1 149
	完全同意	基本同意	不太同意	不同意	说不清	人数
群众向政府反映的意见往往得不到重视甚至连回音都没有	26.8	45.7	15.9	2.9	8.7	1 154

资料来源:江苏农村调查,2000年。

自由市场价值观

许多学者一直认为自由市场与民主制度紧密关联。^①不仅在制度层面,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良性关系;而且在个人层面,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偏好与对民主价值的偏好也是密切相关的。^②基于这种联系,中国农民是如何看待正在进行的这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的,以及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是否影响到他们对

①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2; Barrington, Moore, *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New York: Beacon 1966; Charles E.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Almond, Gabriel,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4 (3), 1991, pp. 467—474.

② James L. Gibson and Raymond Duch, "Emerging Democratic Values in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 In: *Public Opinion and Regime Change: The New Politics of Post-Soviet Societies*, ed. by Arthur H. Miller, William M. Reisinger and Vicki L. Hesli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民主价值的信仰,弄清这些问题就有意义了。因此我推断拥护自由竞争和私有产权之类自由市场价值的人,更倾向于认同核心民主价值。

显然经济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这场改革显著提高了普通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然而,改革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例如通货膨胀,社会福利减少,腐败,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危机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北京进行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对完全采用市场经济或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做法,人们都不太支持。^①经济改革兴起于农村,最初获得了在 80 年代农村改革中得益的农民的强烈支持。然而,自 80 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农村的经济每况愈下;由于农产品价格降低,务农成本上升,加上地方政府乱收费,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对农民很不利。鉴于农民的现状,中国农民是否仍然支持自由市场改革?

对经济体制和所有权结构偏好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示了一种有趣的模式。关于经济体制,极少数人偏好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或以中央计划经济为主导(见表 5)。没有多少人(仅 9.8%)偏好真正的混合经济。与我们北京调查的数据相比,这些数字要低得多。相反,大约 56%的调查对象偏好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或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一数字要比北京调查的结果数据高得多。1/4 的江苏农村受访者在决定哪一种经济体制对他们来说最好时有所犹豫。看来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受到政府支持和推广的市场经济,相比较北京的城市居民,更容易为江苏农民所接受和拥护。这也许是因为北京市民比中国农民受到了更多市场改革所带来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负面影响。同时,中国农民在经济上更为独立,而且他们并不享有很多国家福利和补贴之类的经济利益。

表 5 对经济改革的态度(%)

	完全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为主	半计划半市场	市场经济为主	完全市场经济	说不清	人数
您认为我国当前应当实行何种经济体制	0.4 (2.9)*	6.9 (14.3)	9.8 (26.9)	54.1 (38.0)	2.4 (2.7)	26.0 (18.3)	1 152

① Zhong, Chen 和 Scheb, 1998, 前引文, 第 773 页。

(续表)

	完全公有制	公有制为主	半公有半私有	私有制为主	完全私有制	说不清	人数
您认为以下何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对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最有利	0.5 (3.2)	41.8 (52.7)	14.5 (20.0)	14.3 (7.1)	0.4 (1.9)	28.1 (15.6)	1 152
	太快	有些快	适中	慢了点	太慢	说不清	人数
您认为我国目前经济改革的速度是快还是慢	2.2 (6.3)	17.6 (20.6)	39.0 (42.6)	14.7 (9.7)	5.6 (1.7)	20.6 (19.1)	1 152

资料来源：江苏农村调查，2000。

* 括号内的数字是综合 1995 年和 1997 年北京调查的结果。

当被问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时，大部分受访农民仍然偏好以公有制为主，虽然这一数字比北京调查的数据要低。近 15% 的人支持半公有制半私有制的混合所有制，而极少有人支持完全的私有制。受访者对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所有权制度的支持可归结为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经济上维持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官方政策，即使私有经济（包括境外投资）已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且二十年来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二是在江苏居主导地位的集体乡镇企业。事实上，苏南以其集体乡镇企业而闻名，被人们称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苏南模式”。在进行调查时，乡镇企业仍以集体所有为主。

当被问及经济改革的进度时，近 40% 的受访者似乎对当前的进度感到满意。然而，约 20% 的人认为改革进展得有些快（17.6%）或太快（2.2%）。有趣的是，大约相同数量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改革进展得慢了点（14.7%）或太慢（5.6%）。此外，后两个数据要比北京调查的数据高，这表明江苏调查中的农民要比北京的城市居民更加在意改革。另外，约 20% 的受访者在回答该问题时有所犹豫。这些调查结果说明，我们的农民受访者在经济改革进度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即便多数人倾向于对当前的经济改革进度感到满意。

政治效用

Angus Campbell、Gerald Gurin 和 Warren Miller 认为,政治效用是指“感觉到个人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具有或能够具有影响力”。^①民主价值都是关于在决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以及关于公民个人能够影响和作用于政治的信念。因此,我假设对自己有能力影响政治信心越大的人(即政治效用较高),也就越倾向于认同核心民主价值。为了测定政治效用水平,我们要求受访者评价两项陈述,即“国家发搞得好不好主要靠领导人,一般老百姓起不了什么作用”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即使我有一个好的想法,但如果干部意见不一致,那就不愿说出来,更不愿意因此而与干部发生争执”。我们的调查结果不尽相同。近 60% 的人认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应当取决于人民大众,而不是国家领导人(见表 6)。这一数字实际上比 90 年代中期我们在北京调查的数据要高。不过,在第二个关于挑战权威的问题上,刚好超过 50% 的受访者不愿同权威争论,即使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然而,在我们的北京调查中,有更多的人(超过 60%)不愿意挑战权威。将受访者给予两项陈述的分数加总,形成关于政治效用的总体变量,作为后面多变量分析的一个自变量。

表 6 政治效用水平(%)

	完全同意	基本同意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说不清	人数
国家发展搞得好不好主要靠领导人,一般老百姓起不了什么作用	12.4 (37.0)*	24.0 (34.4)	27.6 (21.8)	30.9 (6.8)	5.1	1 153
在实际生活中,即使我有一个好的想法,但如果干部意见不一致,那就不愿说出来,更不愿意因此而与干部发生争执	16.0 (22.5)	38.5 (41.0)	26.1 (28.7)	13.0 (7.8)	6.3	1 153

资料来源:江苏农村调查,2000 年。

* 括号内的数字是综合 1995 年和 1997 年北京调查的结果。

① A. G. Gurin Campbell and W. E.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 Row and Peterson, 1954, p. 187.

对政治改革的支持

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了跨越式的进展,且改革也相当成功。然而中国在政治改革上却没有什么起色。可是,要说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从未进行过政治改革也是不正确的。相反,中国政治改革一直强调政治合理化与合法化。^①尤其是后毛泽东时期的领导人抛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实践,改革了党和政治组织,旨在提高政府机构效率。后毛泽东时期的领导人,都未决定实施根本性的、系统化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被理解为通过促进决策过程更加透明,促使政府官员对公众更加负责,从而令中国的政治结构更加自由化和民主化。因此,我假定支持政治改革的人更倾向于认同核心民主价值。我们在调查中用来评估对政治改革支持度的陈述项十分直白。我们询问受访者同意还是不同意“目前我国最需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说法。表 7 显示超过 55% 的人同意或完全同意当前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政治改革。受访者的打分在后面的多变量分析中被用来作为支持政治改革这一自变量。

表 7 对政治改革的支持 (%)

	完全同意	基本同意	不太同意	很不同意	说不清	人数
目前我国最需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	23.1	33.6	16.7	3.6	23.0	1 153

资料来源:江苏农村调查,2000 年。

主要的社会人口统计变量

关于主要社会人口同级变量与民主价值认同之间相互联系,有着广

① Zhong, 1996, 前引文。

泛的理论共识。^①运用先前的研究,我推断人口统计因素影响着受访者对民主准则的态度。我特别关注于年龄、教育和性别对人们核心民主价值认同的影响。

年 龄

Finifter 和 Mickiewicz 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苏联的年轻人对民主化的支持更加强烈。^②他们将这一现象归因于苏联年轻人易于接受现代观念,而且思想也比他们的父辈开放。在中国,相似的调查结果也有公布。^③例如,Chan 和 Nesbitt-Larking 认为,中国青年更倾向于批判政府,且更会保护他们的个人权利。基于这些观察资料,我推测年轻的受访者更加认同核心民主价值和准则。^④

教 育

教育一直被视为人们政治态度的风向标。Almond 和 Verba 在他们的重要著作《市民文化》中总结道,“教育成就似乎是对政治态度最有影响力的人口统计因素”(379);^⑤一个人受的教育越多,他或她就越倾向于拥

① Almond Gabriel and Sidney Verba,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Samuel H. Barnes and Max Kaase, ed.,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79; Inglehart, “Value Priorities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ed. by Samuel H. Barnes and Max Kaase, Beverly Hill, CA: Sage Publications, 1979.

② Finifter 和 Mickiewicz, 1992,前引文。

③ Yongnian Zheng,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re They Compatible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9, 1994, pp. 235—259; Alfred L. Chan and Paul Nesbitt-Larking, “Critical Citizenship and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2), 1995, pp. 293—309.

④ Chan 和 Nesbitt-Larking, 1995,前引文。

⑤ Almond 和 Verba, 1963,前引书,第 379 页。

有“市民文化”。^①其他学者还特别指出，不论官方意识形态准则如何，教育有助于增强民主价值认同，因为“教育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信息存储量，而且……促进了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尊重”。^②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总是站在 20 世纪的自由民主运动的第一线。1990 年在中国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教育对政治宽容度起到了积极作用。^③因此，在研究中我推断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核心民主价值和准则的认同就越强烈。

性 别

在中国尽管从 1949 年起政府就开始提倡男女平等，但中国妇女从来未获得过与男子同等的地位。事实上，有争议说妇女地位在改革时期下降了，原因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雇佣者因其所认为的“妇女问题”在就业市场上公开歧视女性，而中国政府在实施有关男女平等的法律方面也极为不力。其结果是，妇女常常从事一些传统职业，例如秘书、服务员、教师和护士等。中国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甚至比城市妇女还要低。大多数中国农村妇女呆在家里，承担着母亲和妻子的传统角色。^④可以合理地推测，妇女在价值观和文化上更趋传统，并且更加顺从于权威。来自于苏联的证据表明，性别同对民主价值和民主化的态度之间存在联系。^⑤特别是妇女由于其社会中的传统女性角色，对民主价值就不那么认同。^⑥因

①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in Five Nations*, 第 380—384 页。

② Duch Gibson and Tedin, 1992, 前引文, 第 355 页。

③ Andrew Nathan and Tianjian Shi, “Cultural Requisite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Findings from a Survey,” in: *Daedalus* 122(2), 1993, pp. 112—114.

④ Jean Robinson and Kristin Parris, “The Chines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Labor, and Women,” In: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ed. by Donna Bahry and Joel Moses,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31—161.

⑤ Donna, Bahry, “Politics, Generations, and Change in the USSR,” In: *Politics, Work, and Daily Life in the USSR: A Survey of Former Soviet Citizens*, ed. by James R. Miller,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61—99; Ellen Carnaghan and Donna Bahry,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the Gender Gap in the USSR,”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22, 1990, pp. 379—399.

⑥ Gibson, Duch 和 Tedin, 1992, 前引文。

此,我推断调查中的女性受访者对核心民主价值的认同度要低于男性。

多变量分析

表 8 显示了对江苏核心民主价值认同调查的多变量分析(一般最小方差多元回归)结果。总共两组自变量(社会经济满意度、收入、政治满意度、自由市场经济认同、政治效用、政治改革认同、年龄、教育和性别)解释了对核心民主价值和准则的认同中 13% 的变动。

表 8 核心民主价值认同的多元回归

自变量	核心民主价值认同	
	非标准系数	标准差
社会经济满意度	.132**	.047
收 入	.019	.021
政治满意度	-.092*	.040
市场改革认同	.323**	.063
政治效用	.115**	.041
政治改革认同	.714**	.078
人口统计因素		
年龄(自然对数)	-.499**	.187
教 育	.147*	.074
性别(女性=0;男性=1)	.302**	.112
常 量	23.621**	.939
倍数 R		.364
R ²		.132
校正的 R ²		.125

* $p < .05$; ** $p < .01$

前面我假设对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满意的人不太倾向于认同核心民主价值,因为这些价值的实现无疑会导致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状况的巨大变革。然而,我们的多变量分析结果否定了这一假设。事实上,分析结果显示感到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改善了的人,更加认同核心民主价值。此外,

收入水平同样与民主价值认同呈正相关,尽管这一联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看来,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改善并没有降低人们对民主的渴望。应当指出的是,这一发现与通常认为的生活条件或物质生活的改善能促进民主化进程的观点相吻合。^①这一观点还被三十年来的证据所证实。^②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常常被引用来解释生活改善与民主自由渴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③正如 Larry Diamond 所注意到的,“虽然低层次需求的满足并不会自动使个人对政治自由和影响力的需求更加突出,但它更可能使人们重视这些需求”。^④这一发现为中国的民主化指出了更加光明的前景,因为经济改革还在继续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生活条件。

表 8 还显示在我们的调查中,越是对政治感到不满的人,越是倾向于支持民主价值和准则。政治满意度的指标主要是通过对廉洁政府的满意度来衡量的。毋庸置疑,腐败在中国是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人们心中的首要问题之一。政治满意度与对民主价值和准则的认同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人们期望利用民主制度来消除或减轻官员腐败问题。

我还假设支持市场经济的人更倾向于认同核心民主价值。这一点为多变量分析所证实(见表 8)。这一结果对“新权威主义”理论提出了质疑,该理论认为市场经济转型会阻碍民主改革的进行。分析结果还证实市场经济与民主价值和制度之间存在着正向联系,正如 Joseph Schumpeter 和 Robert Dahl 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⑤在当今中国,无论是市场化还是民主化,都涉及将权力由国家转向个人。这一正向联系为中国的民主化指出了更加光明的前景,因为市场改革仍在进行,这将会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因此,我们所能期待的是,进一步的市场改革将有助于在中国建立更

①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Garden City, NY: Anchor 1963; Inglehart, 1990, 前引书。

② Diamond Lar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In: *Reexamining Democracy*, ed. by Gary Marx and Larry Diamond,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 125.

③ Maslow Abraham,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4.

④ Diamond, 1992, 前引文, 第 126 页。

⑤ Joseph Schumpeter, 1942, 前引书; Robert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加民主的政治制度。

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我的多变量分析还表明,政治效用越高的人,更倾向于认同核心民主价值。另外,正如前面所假设的,表8显示有所感知的政治改革需求与核心民主价值认同之间有着正向关联。因此,渴望政治变革的人倾向于支持中国潜在的民主化。受访者尤为关注的改革形式包括:更多的新闻自由,有意义的、竞争性的选举,以及平等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而不管其政治观点如何。

最后,研究中的三个主要人口统计因素全都与民主价值认同密切相关。我们的多变量分析表明,年轻人、男性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倾向于认同核心民主价值和准则。这一结果与在其他国家所发现的经验性证据所吻合。关于年龄和教育的分析结果为中国的民主变革指出了更加光明的前景,因为未来属于年轻人,而人们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总 结

在中国,民主的缺失传统上总是被归咎于中国农民,因为农民被认为是在文化和政治定位上落后,缺乏教育,顺从权威。然而,对江苏省南部收集来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所获得的结果,与关于中国农民的传统思维和观念恰恰相反。当然,我不想将我们的描述性调查结果套用到中国其他农村地区,因为苏南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农村地区之一。但是,我们的多变量分析却可以用来概括整个国家的情况,因为分析是在个体层面上进行的。^①这与 Adam Przeworski 和 Henry Teune 所主张的“最不同的制度”设计中所运用的基本原则如出一辙。^②

调查的描述性数据显示,调查中的农民表现出了较高水平的民主价值观和政治效用。他们绝大部分赞同选举是官员提升和任命的途径;他们非常支持新闻自由;并且他们表现出了较高程度的政治宽容度。调查

① Manion, 1994, 前引文, 第 747 页。

② 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1970. pp. 34—39.

结果显示,苏南农民比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北京调查中的城市居民具有更高水平的民主文化。此外,调查结果表明改革时期的社会经济满意度水平高。可是多数受访者对他们当地的腐败情况并不乐观。另外,调查中的农民确实要求更多的政治改革。这些调查结果表明,要说中国农民没有作好接受民主制度的准备,这可能是草率的、不正确的。我们所调查的地区中的农民看来已为迎接民主变革作好了充分准备。

在经济方面,政府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所作的努力,赢得了受访农民的高度支持。事实上,江苏农村调查的受访者中,支持市场经济的人要多于北京调查的受访者。这可能是因为市场改革(例如去公有化)发生于改革初期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而在中国农村没有国有企业。

多变量分析则更能说明问题。首先,我发现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削弱人们对民主价值和准则的信仰。事实上,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经济生活越满意,就越倾向于认同核心民主价值和准则。我还发现江苏农民的政治效用越高,政治满意度越低;自由市场价值观对民主价值观有促进作用。另外,有所感知的政治改革需求有助于加强民主价值认同。最后,分析结果表明,年轻人、男性,以及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更倾向于认同民主价值和准则。

总之,这些研究结果为中国农村的民主化进程指出了更加光明的前景。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农村地区总体上正逐步失去稳定性,这是由一系列原因所造成的,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和腐败,政府的政策失误,以及农民的生活状况没有改善。农民的群体事件在当今中国并不鲜见。幸运的是,对中国政府而言这些群体事件缺乏有效的组织,往往是自发性的,针对事件的。中国的稳定 and 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广袤的农村地区。如何在满足农民政治需求的同时,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实现民主制度可能是部分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国政府已经在中国农村开始了民主实践的试验。民主实践能够走多远,我们将拭目以待。

(钟扬,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系)